

书评  
Book Review

# 怎样把华语研究做大做强？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 阅读札记

刁晏斌  
(DIAO Yan Bin)

经过一个学期的忙碌，终于进入假期模式，也有时间细读马来西亚邱克威博士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了。此书系邱博士近年来华语研究成果的汇集之作，2018年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书中的不少篇目虽然以前已经读过，有的还多有引用，但是此次集中展读，形成了一些比较完整的印象，同时也对作者整体的研究思路与特点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这里略陈一二，以就教于通人方家，兼向《论集》作者请益。

笔者通观《论集》全书，对其形成了以下三个非常突出的印象：

第一，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全面。

作者在其《我之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设想与实践（代序）》（以下简称《代序》）中谈及，他的研究范围及于词汇、语法、语音，最终乃至于社会语言调查的结合研究，以及华语历史文献的分析评述，而陆俭明先生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则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化问题研

---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20

究，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研究，马来西亚华语及其方言的某些语音问题的讨论，马来西亚社会语言学研究，马来西亚华语词汇、语法语病分析，对《全球华语词典》等辞书与某些论著的评介。

仅就以上表述来看，《论集》的涉及范围已经是相当广泛了。然而，这样的研究范围当然不会是一下子形成的，《代序》中对此就有一个概要性的介绍：“从2011年开始关注报章语病，到思考华语规范工作的原则与操作问题，又经此延伸及于语言系统的共时描写，再追溯到历时系统的考察，最后则由华语系统扩大至方言系统。”

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循着一个怎样的理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点，《论集》中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例如：

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得以观察语言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揭示更多语言演变的现象与规律。

（《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

为此我力求每一篇论文都有创新，探索新的问题，寻求新的方向；希望通过我的实践展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乃至全球华语研究的可能性。

（《代序》）

也就是说，一方面得益于对上述“丰富性”与“多元性”的认识，这可以说是整个研究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则是展示马来西亚乃至全球华语研究的“各种可能性”，即尽最大可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进行具有创新性、甚至开创性的探索。

第二，研究深度超乎一般研究者。

这一点，是笔者早在此前读过作者的某些论文后就形成的一个印象。在整部《论集》中，《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音读变异》是笔者比较欣赏的一篇，下面就主要以此为例并结合其他篇什中与之相关的内容进行说明。

本文的副标题是《多方言社会中语码转换与语言混合的现象考察》，

明确地交代了研究对象。语码转换与语言混合现象在不同的言语社区都会发生,而在像马来西亚这样语言环境与语言生态异常复杂的社会中其表现更加突出,并且经常是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最终在语音、词形、词义等方面均有表现,已有研究以及工具书编纂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往往也与此有关。对此,作者能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全面审视,从而在诸多因素与复杂现象中理出头绪,归结为语码转读、语码混读和语码变读三种类型。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将其置入方言词进入华语的历史进程,即语码转换到语言混合的历史发展序列中,进行解释。据此我们通过音读问题的处理,制定判断方言与华语‘混合’程度的标准,从而解决词典的收词标准及方言借词的注音问题。”(《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而在《书面性与音变性为二重标准的“华语词”界定——兼谈马来西亚〈现代华语词典〉修订工作的收词标准》一文中,则围绕华语词的界定与收词标准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由此而形成了更加完整的、具有系统性的系列研究。

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是真正地在“做学问”,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理论性或学理性,文中恰当地引用一些中外名家的经典论断,使整个考察与立论都有了一个坚定的基础和抓手;二是对普通话、方言、古汉语与外语全面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事实的深入、全面、细致发掘;三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比如指出由“语码转换”为一端的临时混用的“转码”,发展到“语言混合”为另一端的固定吸收的借词,其实是一个语言接触下引起的语言变异连续线,若从接触角度来看,可解释为接触深度的差异;若从历时角度分析,就是演变阶段的差异(《书面性与音变性为二重标准的“华语词”界定》);四是总结归纳一般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比如就这一问题的研究而提出可供操作的“书面性”与“音变性”的二重标准,以及主张采取以下做法:一是广泛地搜罗存档,对目前客观事实进行记录,二是深入民间各层面,对使用广度深度进行了解,三是多方面采集样本,对音读书写形式进行描写,四是制订收词的标准,对研究材料进行性质的界定。(《店铺招牌中的马来西亚华语词汇》)

除了本篇外,《论集》的其他很多篇目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上述特点。再如《〈叻报〉记时词语特点考察记略》,其第一部分“西历、华历的不同表示法”总结出1910年代之前,西历用“某月某号”,而华历用“某月某日”的规律;而1910年代之后,多用西历,所以上述“号”“日”的区分已无意义,因此1920年代以后就一律用“日”了。此外,作者还提到,就马六甲青云亭的《公议条目簿》中所见的理事会议记录来看,上述中西历以“日”“号”分别并记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另外,再如在《叻报》中发现了“星期”早在1887年的用例,且用于表现Sunday的意思,早于目前已经明确的时间;还指出有理由相信,Sunday义是由“礼拜/星期”发展为“礼拜日/星期日”,而“礼拜日”与“礼拜一”内部构词并非平行的,前者的构词理据是“礼拜这一日”。再如,文章对从“钟鸣某点”到“某点钟”再到“某点”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理据,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梳理与表述。

### 第三,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论集》作者在《代序》中指出,《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是对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整体设想,其中提出“历时研究”的思考方向,是此前未曾关注过的。作者的主张是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来探讨马来西亚华语的本质特征并进行描写,同时挖掘其语言学研究的意义;并且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这种共时描写与历时溯源的结合研究,正是一种语言进行全面处理的方式。”(《马新华语词汇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特有词语词典》)

作者对共时与历时二者的结合,远不止停留于一般的认识与表述,以及某些具体的操作,他的可贵之处是把历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一文明确指出:“首先从历史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来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环境中发展已有上百年历史,这期间产生的差异必然很大。”“共时层面的横向比较是目前较多关注的,然而不能只停留在差异的描写而不追溯形成差异的原因及其语言内外机制;这就必然将我们的视线投向历时层面的探讨。通过马来西亚华语早期语料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将马来西

亚华语的形成置入整个现代汉语发展的脉络中考察,并结合马来西亚特殊的语言环境,深入揭示这一过程中的语言学意义,即:现代汉语中各种变异形式互动的动态复杂性,这属于语言内部机制;以及外部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作者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如《代序》中指出:“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是近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直接产物,从其形成历史及形成途径来说:一、与整体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同步展开的,二、形成环境与内部构成都具有独立性。就其与主流共同语的互动来看,其中有三波重要的影响时期:第一是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第二是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华语影响;第三是21世纪伊始的大陆普通话的影响。”在《〈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一文中,则归纳、强调了四个“考察视角”:一是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视角,二是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中方言与官话二系互动的考察视角,三是新马华语词汇形成的历史考察视角,四是民国国语运动对新马华人华语词汇应用影响的考察视角。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视角,始终贯彻于我的所有研究中。”(《代序》)

《论集》作者这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围绕《叻报》的系列研究。之所以选择叻报,是因为它的词语具有“巨大研究潜质”“对于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语料”。因此,它的词汇语料“提供我们一个观察新马华语词汇历时演变的视窗。”(《〈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的认识是:“上述这些词语使用的变化(按指‘碓石’被‘钻石’替代,‘差馆’被‘警察局’替代等)均发生于1910年代后期至1920年代,这同时还可印证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以至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马来西亚语言生态的影响。这一语言生态变化对于新马两地华语词汇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至今仍未进行深入探讨。”(《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

不仅华语的历时,作者还提出了“马新华语词汇研究史”的概念,主要见于其《马新华语词汇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特有词语词典》一文。这样,语言史(华语史)与语言学史(华语研究史)二者合一,就形成了更为完

整、更加全面的历时研究。

《论集》作者的华语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以上三个方面远超一般学者，笔者认为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其一，是具有全面、扎实的语言及语言研究知识。陆俭明、李宇明二位《在《论集》的序言中，均重点提及本书作者学养深厚，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一旦投身相关研究，便能在多方面取得成绩，而陆序对此说得更加具体：“他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在中国文学、汉语史、现代汉语和方言学诸方面基础都较扎实，对新马华语也有很好的了解，知识面很广，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并有很好的古文献考证能力和很强的研究思辨能力；在汉语教学方面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比如，《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音读变异》一文中有大量的结合古代及近代文献的考证说明，对一些古书中的音注等都是信手拈来，并与不同的方音进行比对，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汉语史和方言学功底。我们真心希望，能有更多具有宽广、深厚学养的学者投身这一研究，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把这一研究做大做强。

其二，是对华语具有系统全面的认识。这一点，仅从书中的很多相关表述中就可以清晰地把握，以下一段话可以作为作者的研究纲领：

作为掌握马来西亚华语第一手资料的马来西亚语言研究工作者，我们自己就得将马来西亚华语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看待，即将其置于整个汉语历时发展与共时变异的大环境中进行审视，纵向看其历时变化，横向看其地域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进行客观描写，揭示其深厚丰富的文化、社会、历史、语言等方面的内涵。

（《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

属于此类的认识和表述还有很多，再胪列几段于下：

华人语言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现象中的一环，是依附于其特定社会结构的；如此将之抽离其历史及社会，必然忽略当中许多细

微课题,乃至分析无由深入、解释不够缜密。

(《代序》)

零星材料的蒐集虽然难免,但更需要系统性范式论述;否则单见其树却懵然不知身处丛林中。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专号”前言》)

全球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工作,有赖于各“华语”成员内部词汇系统的完整描写;而这种系统描写要做到客观而合理,就必须结合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的研究。

(《马来西亚华语中“有者”的词汇描写分析》)

如果说以上的系统性是着眼于整个华人社会现象,以及华语的整体及其研究的话,那么以下的系统性则是着眼于马来西亚华语内部的不同使用区域: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某些词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即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马来西亚华语看成是完全统一的铁板一块,其实内部南马、中马、北马仍是有一些差异的。

(《店铺招牌中的马来西亚华语词汇》)

而以下一段话则体现了华语研究系统性的另一个方面,表面看是对汉语及汉语史研究的反哺,实则是古今并蓄的“大华语”系统研究:

通过对马来西亚华语文献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一些语音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些发现甚至可以用来印证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些演变问题,解释一些汉语语音史上疑难的特殊音变现象。

(《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

总之,系统观在本书中几乎无处不在,而其作者华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有意识地把自已的研究纳入某一系统之中,并且进一步明晰、

甚至建立新的系统，套用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表述，是进行“网格化”的研究。

其三，是掌握合理、适用的方法。一般认为，传统的中国学者，较少直接说明或讨论其在具体的研究中所用的方法，而是使之从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来。《论集》在很多时候固然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会直接点明自己所用的方法，并进行相关的表述。例如，在《〈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一文中，对上述把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方言词汇的音读变异情况按其音变形式分为三类，作了方法论方面的说明：

“置于语码转换与语言混合的发展序列中进行历时性的探讨，以此作为分析华语词汇系统吸收方言成分的判定参考。如此一来，我们才有一个分析方言与华语成分的操作方法。”“惟有制定分辨方言成分与华语成分的标准后，才能真正将新马华语研究带上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

类似的表述再如《代序》中的以下两段话，分别概括了从“小”到“大”的两种方法：

我始终是不惮其烦地由一个词语一个词语进行疏解分析，即所谓“小题大做”。

无论任何课题，我的研究都力求做到掌握材料的穷尽性与分析上的系统性，更加尤其重视将材料置于整个现代汉语研究的学科框架之中进行审视。

按一般书评类文字的写作模式，谈完了“优点”，接下来就该说一说缺点或不足了。平心而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论集》作者“入行”时间毕竟尚短，全部篇什均分布在2011—2016年的五六年间，加之不同时间、不同题目的论文汇为一编，难免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论集》中之所以出现某些问题，根本原因还不在于此，而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时代的局限”，即受华语研究所处的“初级”阶段性的拘限。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先看第一个例子。中国大陆学者邢福义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实践中，提炼出“两个三角”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大三角”是“普

(通话)、方(言)、古(代汉语)”。其后,陆续有人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补充,比如田小琳有《“普一方一古一外”的比较原则在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中之应用》(2018年全国学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唐贤清、姜礼立、王巧明有《汉语历史语法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古汉语研究》2019年第4期)。另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晓梅的《“古、方、普、外”——论全球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Global Chinese”2018年第2期),因为这完全是立足于华语实际、着眼于华语研究所作的归纳与表述。不过,考虑到“普”即普通话的概念确立于上世纪50年代,而其具体所指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地区通行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所以我们认为上述四个视角还不能准确概括华语所受的全部影响及其所有的观察角度,此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国(语)”,指的是1949年之前通行于中国大陆以及向海外华人社会输出的民族共同语,即上引“马来西亚华语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母体”,我们在研究中为了与当今台湾地区使用的“国语”相区别,称之为“早期国语”。我们的基本认识是,马来西亚华语(其实整个东南亚华语都是如此)在早期国语的基础上,融入方言、古代和外语以及后来的普通话因素,最终成就其今天的面貌,所以,这个“国”是一个基础性的视角,因而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我们看到,当今不少论著中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不少就与这一视角的缺失有关。《论集》中的《马来西亚华语中“有者”的词汇描写分析》一文,对“有者”只简单考察了其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最后顺着陆俭明先生的说法,认同其为“生造”,认为其理据不足。后来,赵敏的《马来西亚华语“者”缀词语的变异性考察》(《汉语学报》2018年第3期)对这一形式追溯到中古时期的汉语,列出以下一例:

佛诸弟子中,有者双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粪壤,有者呵骂河神。

(《续传灯录》)

我们则把视线下移到早期国语,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用例,比如《申

报》1911年10月24日所刊一则“新发明秘制美髯卫生枪上戒烟膏”广告의 片断：“成癮之人，岂不竭思戒除？有者身体素弱，有者戒志不坚……”而此后的几十年间“有者”的用例也时有所见。把以上情况考虑进去，则邱文的论证及结论等无疑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再看第二个例子。这涉及规范观及其具体操作，这也是当下华语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远未得到圆满解决。《代序》中提出，要摆脱某些“对错”“规范”等价值取向的干扰，并且引用了陆俭明的话“我们是要考察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但是不能认为凡见到、听到与中国普通话在语法上不同的就都是华语语法的特点，‘不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论集》作者就此补充道：“这些不属于‘特点’的基本可归为两种情况：一是‘错误’；二是‘非华语’（比如属于方言形式或用法等）”。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确实有一些人在这方面纠缠不清。《马来西亚三大中文报章的语法错误分析》一文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二者，比如把“有+VP”这样的既见于一些南方方言，也见于早期华语，当下又在几乎整个华语世界都广泛使用（包括已经进入普通话）的形式也列入病句，显然有失考虑，而文中所列类似的可能并不属于语病的形式还有一些。另外，在《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一文中，作者又把“我有吃饭”作为反映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特点的例子，而这又属于上文所说非一时一地的论文之间协调一致方面的问题了。

总之，我们的基本认识是，《论集》中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与其说是作者本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受限于目前整个华语研究的水平及其所达到的高度，这应该是深层次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苛责作者，而是希望大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华语研究水平和质量，使之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最后，回到本文的标题：怎样把华语研究做大做强？我想《论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出了本书作者的答案，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加深”与“拓展”。其实，本文标题提出的也是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思考的部分结果在《论全球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刊于《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期）中有所呈现，具体而言，“加深”

涉及“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华语及其研究理论基础的确定与深化、相关理论的应用、建设与创新等,后者则是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及手段,以求对多方面的语言事实作进一步的高清晰度或细颗粒度的考察、分析与描写;“拓展”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覆盖区域与覆盖内容的扩大,而后者则包括相对宏观的对全球华语起源与形成及其扩展分布路径等的考察,以及比较微观的对具体语言事项的显、隐以及发展变化的描写。上述加深与拓展的共同目标,就是把全球华语研究做大做强,使之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和层次。现在,《论集》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循此以往,相信我们终究能够走上华语研究的宏富之路。

在本文结束之前,还想附带提一下,笔者一直向学生灌输,一般的学术阅读有四个目的,即学知识、学语言、学方法、集问题,算是一点经验之谈。通过仔细阅读《论集》一书,笔者也学到了一些关于马来西亚华语及其运用的知识,比如通过“大陆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其实这不是某一撮人的人为规定”这样的表述,对数量结构“一(小)撮”在华语中非表贬义有了更直观的印象;通过“仿佛四十余年前就预见当下的困境而安插的一星烛火”,而对“安插”一词的意义也有了新的了解。诸如此类,所在不少,对笔者这个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队伍中的“外来者”而言,这也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最后,借用《论集》中的一句话结束本文,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意义、价值及魅力尽在于此:

“马来西亚华语”不论是形态的丰富性、还是变异的多样性,不论是汉语历史演变的角度,还是汉语地域变异的角度,都绝对是一块绝世璞玉,只待有心人切之磋之、琢之磨之,将其耀眼的玉质展现出来。

(《吾未如之何也矣——周清海先生回忆录中〈我和《全球华语词典》〉一章读后的省思》)